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國科會專題計畫成果報告撰寫格式說明 Preparation of NSC Project Reports

計畫編號：NSC90-2411-H-009-020

執行期限：90年8月1日至91年7月31日

主持人：劉紀蕙

JoyceLiu@cc.NCTU.edu.tw

執行機構及單位名稱：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 八十六年度及以前的一般國科會專題計畫(不含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亦可選擇適用，惟較特殊的計畫如國科會規劃案等，請先洽得國科會各學術處同意。

一、中文摘要

計畫名稱：「台灣／中國現代主義文學與變異Ⅲ－Ⅲ」

此計畫之整體考量在於企圖以台灣現代文學史與中國現代文學史為對照閱讀之主軸，同時銜接當時之整體文化論述脈絡，深入討論台灣與中國現代文學在現代文化史內之位置以及相關議題。此研究問題的起點，是希望能夠思考為何世界現代主義文學與藝術盛行之時，以及西方展開重新認知意識狀態的精神分析論述持續發展之際，中國與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與精神分析論述有了開端卻立即被壓抑？中國與台灣的文學場域中現代主義運動所面對的大論述（兼含左翼與右翼之國族論述與組織化運動）在何處？此現代主義文學與論述發展的斷裂處以及歷史節點在何處？

本計畫進行過程中，研究問題環繞著中國／台灣的現代化進程中革命意識與建國論述如何將現代主義的發展偏離其原初點，討論重點刻意聚焦於歷史論述的斷裂處。此計畫第一年度到第二年度，先後完成了三篇論文（請參考第二年其中報告）：

一、〈災難圖像與歷史肢解：從台灣當代前衛藝術家陳界仁的『現代化』詮釋計畫談起〉（第一年計畫完成之成果）

二、〈前衛、頹廢與國家形式化：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進步刊物插圖所呈現的視覺矛盾——以中期創造社為例〉（第二

年計畫完成之成果）

三、〈壓抑與復返：精神分析論述與台灣現代主義的關連〉（第二年計畫完成之成果）

談論陳界仁的文章是個方法論的暗喻模式起點，二、三〇年代郭沫若與創造社的轉向，以及六、七〇年代台灣現代主義論戰中精神分析論述的矛盾並陳，都透露了現代主義與精神分析論述遭遇壓抑排拒而斷裂的時刻。

本計畫第三年則更將問題聚焦於台灣三、四十年代如何構成了現代崇高主體的探討。對照本人曾經完成有關中國三十年代革命論述與崇高現代主體的討論〈三十年代中國文化論述中的法西斯妄想以及壓抑：從幾個文本徵狀談起〉，本計畫第三年所進行的研究則是台灣三、四十年代皇民化運動所產生的「皇民我」的殖民現代主體。此篇論文〈皇民我與崇高主體：殖民現代化與精神建構〉將於2003年五月發表。這兩篇論文都繼續回應現代主義文學與論述發展的斷裂處以及歷史節點如何發生，以及此斷裂背後的主體位置——一個朝向新秩序與現代性的崇高絕對主體。

關鍵詞： 殖民現代性，皇民主體，現代性主體，皇民化運動，周金波，陳火泉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address the issue of the Taiwanese subject position as the “Emperor’s Peopl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is subject formation is clearly achieved through the project of modernity under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This process of subject formation is deep-rooted and has long lasting effect upon the Taiwanese’s sense of subjectivity even today, fifty years after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as over. To explain the firm and even passionate grasp of the elder Taiwanese’s affections towar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would die for the Japanese Emperor during the war time, and also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still unconsciously differentiate themselves from the Chinese coming from mainland China after 1949 basing on their concept of the subject of modernity, we need to consult the 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 of this process of subjection formation. This diverse sense of subjectivity triggers the fundamental disputes and conflicts among the Taiwanese communities. This paper then also address to the question as to how does psychoanalytic theory answer to our pressing cultural and social problems of today.

In *The Path (or Logos)*, a novel written in the 1940’s, the protagonist, suffering from the desperate condition of his identity as a Taiwanese and not a Japanese, said that the path to becoming the “Emperor’s People” is through the “Faith” in the Emperor, as if through a “leap” to the “God’s realm.” The Freudian concept of the mechanism of identification is clearly demonstrated in this

fiction through the protagonist’s elaboration of the logic of the Taiwanese’s subject forma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protagonist explained explicitly, “to believe in the Emperor is to extinguish oneself, to forsake worldly objects, and to leap up to the realm of God.” Hence, the loyalty to the Japanese Emperor is experienced as a religion, a religion of the New Nation, and a religion that offers salvation. He further explained that this “leap” does not require the process of time. This change of identity through faith is thus immediate, and it is complete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he mind. Through this reasoning, we see a clear process of identification in which the Taiwanese becomes a Japanese Emperor’s subject.

There is a close parallel and also a subtle deviation between the formation of the Nazi subject and the Japanese Emperor’s Subject. The Japanese Emperor, as the Leader in Hitler’s the Third Reich, functions as the mysterious and mythical core of this new religion. The “gift” endowed by the Emperor, like a gift from God, cannot be repaid except through whole-heartedly offering one’s own life.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this process of identification, the Nazi logic of the blood can be dissolved and replaced by the logic of “spiritual genealogy.” The protagonist finally sought the subject position as the “Emperor’s-Subject-I”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different identities of the Islander-I and the Emperor’s People, a bridge of aestheticization, to dissolv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and to leap toward the idealized construction of a new subject form. This fantasy of identification and incorporation of the sublime object consequently creates a correlated imagination of the diseased and

unclean blood within the body that the subject is eager to expel. The force of expulsion, as performed in the fictions and biographical accounts of the 1940's, still presents itself within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arena of today in Taiwan.

Keywords: colonial modernity, subject of modernity, the Imperial Subject

二、緣由與目的

本計畫之原初目的，是企圖建立不同的現代文學史脈絡閱讀策略，探討中國與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與精神分析論述有了開端卻立即被壓抑？此計畫進行過程中，發現問題核心在於在殖民處境以及現代化建國論述下，台灣與中國現代文學史轉型中的所發生的潛在動力以及其被壓抑的反向動力。

精神分析式的「翻譯」以及尋求欲力投資的轉移，是本計畫貫串的方法論。我認為，文化場域中的底層能量，會藉由文化對象物之轉借投資以及扭曲偽裝的路徑，而尋得其意念的代表。以精神分析的詮釋技術，翻譯文化場域中被扭曲的欲力，將其帶到意識層面，回到語言的層面，是使被壓抑或是斷裂的欲力得以發言。此處，被壓抑的欲力，是指被歷史或是現代化進程中國家機器所執行的遺忘機制所失落的歷史面貌。這也是荷米·巴巴(Homi Bhabha)在*Locations of Culture*一書中所討論的，現代國家追求「國家性」的意志力(will to nationhood)，必然包含建立民族歷史的國家機器暴力，以及遺忘民族過去的意志力。這是建立國家統一的一套「遺忘的文法」(syntax of forgetting)與「遺忘的義務」(being obliged to forget) (Bhabha, 160)。我們所面對的，是被遺忘的中國二、三十年代的法西斯衝動，而我們所要進行的，不僅是觀察當時文人如何借用外來語彙翻譯出

內在的文化精神現實，也是一種回溯的工作，對於被壓抑遺忘的歷史過去進行一種「文化翻譯」，將此斷裂的歷史認知帶回到文化意識之中。

要如何探究此「症狀」背後的壓抑或是反投資，以及其抗拒呢？佛洛伊德曾經強調，精神分析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去「翻譯」症狀(Freud:1920, 1-64)，也就是將「症狀」之下被壓抑的無意識意念「翻譯」到語言的層次，進入意識系統。我所關切的問題，是文化系統如何將無法接受的異質物壓抑，而轉換投資到另外一個文化對象物，而我們又要如何閱讀此被轉移的投資工程，以便翻譯出沒有被面對的真實文化欲力。

本計畫第一年與第二年的三篇論文，皆有意聚焦於歷史論述的斷裂處。談論陳界仁的文章是個方法論的暗喻模式起點，二、三〇年代郭沫若與創造社的轉向，以及六、七〇年代台灣現代主義論戰中精神分析論述的矛盾並陳，都透露了現代主義與精神分析論述遭遇壓抑排拒而斷裂的時刻。

本計畫第三年的問題則是更具體的探究：現代性如何在中國與台灣展開？日本的現代性如何影響中國與台灣的現代性？以致於決定了台灣的自我定位與族群衝突的起點？因此，本計畫第三年將問題環繞於台灣三、四十年代如何構成了現代崇高主體的探討。對照本人曾經完成有關中國三十年代革命論述與崇高現代主體的討論〈三十年代中國文化論述中的法西斯妄想以及壓抑：從幾個文本徵狀談起〉，本計畫第三年所進行的研究則是台灣三、四十年代皇民化運動所產生的「皇民我」的殖民現代主體。此篇論文〈皇民我與崇高主體：殖民現代化與精神建構〉將於2003年五月發表。這兩篇論文都繼續回應現代

主義文學與論述發展的斷裂處以及歷史節點如何發生，以及此斷裂背後的主體位置——一個朝向新秩序與現代性的崇高絕對主體。

三、結果與討論

當前有關文化主體性的論述，多半都透露出了建構論的取向：以特定歷史與文化之脈絡，以及其所牽連之社會關係與訓練機制和技術，而導引形成「主體」的構成。依此觀點，主體是歷史過程下，經歷內化認同而獲取的特定主體關係，主體位置是被語言與象徵系統所模塑，被管理機制與物質環境所制約，被集體記憶以及文化儀式反覆增強。

此種主體建構論的觀點，以傅科對於「主體形成」的討論最具有代表性，傅科經指出了所謂「主體」的慾望模式與倫理關係是如何建立在權力機制的管理模式之上。*Foucault* 在 *The Use of Pleasure* 的序論中，很清楚地指出他所探討的問題，著重於「倫理主體」(ethical subject)，也就是個體如何構成他自身道德行為的規範，如何以忠誠來嚴格執行禁令與責任，服從規範與控管慾望之掙扎，復興精神傳統，或是以自身的生活，或是生命，來示範特定範疇的美、高貴或是完善的標準，甚至透過長久的學習、背誦、教養，來盡其所能的服從紀律，棄絕愉悅，嚴厲打擊惡行 (1985:27)。他在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一文中，也指出生產、符號系統、權力以及自我的技術中，以「自我的技術」為最重要的一環：「使得個體得以透過他們自己的能力或是他人的協助，而操控他們自己的身體與靈魂，思想，行為與舉止，以便改變自身，進而達到愉悅、純淨、智慧、完滿與不朽的狀態」(1988:18)。

當我深入思考文化的主體性問題時，我注意到建構論所不能企及或是解釋的面向。例如，什麼樣的強大力量會使得主體積極朝向一個理念高點躍升？或者主體在朝向「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縫合時，他所「貫注/投資」(cathect, invest)的，是什麼？又什麼因素使得 Foucault 所談論的主體願意棄絕愉悅、銷毀自我？Stuart Hall 也曾經指出，Marx, Althusser, Foucault 一直都無法解釋個體如何被召喚到論述結構之位置中，也未解釋主體如何被構成。雖然晚期的傅科指出了自我規範、自我模塑之自我技術，Stuart Hall 仍舊注意到自我認同（或是不認同）的召喚機制的無意識層次未被討論。(Hall 14)

三十年代的中國，無論是左翼陣營的論述或是右翼陣營的論述，呈現了清楚的法西斯式的我他區分，以及對於烏托邦秩序的唯心訴求。這種論述位置與「我」或是「我們」的論述位置，是密切相關的，也就是文化主體性的問題。現代化過程中的文化論述如何建立「好」的主體，而清除「壞」的份子，便標示了此文化中現代性主體的位置。

這種朝向集體的內部向心而同時區分我群／他群的位置，以及以新國家與新秩序為核心所建立的現代主體，也發生三十年代日本京都學派哲學家如 Kôyama Iwao 與 Kôsaka Masaaki 的主體性論述中，可以十分清楚地觀察得到。酒井直樹曾經討論過，1941 年一個討論歷史發展與國家道德的圓桌論壇中，Kôyama 強調主體的道德力量應在國家，而不在個人。國家是所有問題的關鍵，無論就文化而言，或是政治而言，國家都是道德力量的核心。同一場論壇中，Kôsaka 也表示同意此種說法，並且認為民族本身並無意義；當民族擁有主體性時，自然便形成國家民族。沒有主體性

或是自決能力的民族，是沒有力量的。（引自 Sakai 167）酒井直樹指出，這兩位京都學派的哲學家認為現代國家必須是意志力的呈現(jiko-genteisei)，國家主體必須具有自決的能力。現代國家需要形式化，以便擁有自覺，並且實踐自身之意志力。酒井直樹因此認為，此種現代主體性與黑格爾的辯證論法並無差異。（Sakai 167）

在另一個討論「大東亞共榮圈的倫理觀與歷史觀」的圓桌論壇上，Kôsaka 提出中日戰爭便是一場道德戰爭的論點。他強調日本民族的道德力量比中國更強，因此，日本應該派遣更多道德高尚的人去中國，以便讓中國人民知道日本民族的道德優越性。Kôsaka 還強調，當中日戰爭擴大為亞洲戰爭，那便是東方道德與西方道德之戰，而問題的關鍵便在於哪一方的道德將會在世界歷史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引自 Sakai 168）酒井直樹指出，此種論調將歷史視為道德之發展史，而道德優越者便將解放全人類視為己任。（Sakai 169）

太平洋戰爭時期中，這種具有道德優越位置並且與國家民族結合的現代主體，在臺灣日據時期「皇民我」與「本島我」混同的尷尬主體位置中，造成了對於「本島我」之污穢病態的身體化想像。

本論文探討日據時期殖民政府的現代化工程所模塑出的現代性主體以及其中牽涉的複雜主體心理過程，例如皇民我或是本島我的矛盾，或是此內化的精神系圖如何遺傳到了當代的台灣人心理結構之中。本計畫除了希望能夠對於台灣的文化脈絡下的殖民現代性主體提出解釋之外，對於文本現象進行歷史文化社會脈絡的掌握，亦提出精神分析介入文化研究的論述模式。

四、計畫成果自評

在進行這個研究與書寫的過程中，我反覆面對與必須自我反問的幾個問題是：

1. 我以精神分析的閱讀方式重讀中文場

域內現代化建國工程所呈現的文化症狀，從精神病的症狀到文化現象的「症狀」之間的銜接如何建立？在個別文本中所呈現的個人差異，如何又反應出集體時代與文化的共同歷史創傷？被現代化過程中理性功能所壓抑的 the uncanny，如何再度於文化場域中出現？而面對「異文化」而排拒的恐懼結構——對於非家的，不熟悉的場域的排拒——如何反覆出現。

2. 我要如何以文化研究者的身分，處理因現代化過程而壓抑並且遺忘的文化記憶？文化研究者如何在離開臨床精神分析之場域中，進行精神分析式的閱讀與詮釋？精神分析過程所強調的治療，是使「精神現實」復甦，使主體之無意識透過語言而進入意識之層面。在文化研究的操作中，此被喚醒的「精神現實」是什麼？誰的無意識可以被帶入意識層面？精神分析過程中所發生的情感轉移與反向轉移 (transference/counter-transference) 之中所引發的語言交換與幻想的流動，在文化研究的書寫過程中如何發生？

本計畫為期三年，計畫結束後，將以書本形式出版。目前，本計畫暫擬之大綱如下：

第一部份 方法論

- 1 主體性：行動主體 subject，社會從屬性 subjectification，身分 identity，身分同一性與認同過程 identification
- 2 論述構成與精神分析 discourse and psychoanalysis
- 3 視覺系統與主體位置
- 4 現代性、崇高主體與歷史創傷：法西斯衝動與形式美學

第二部份 現代性與主體位置

- 5 『現代性』的症狀與昇華：陳界仁的歷史肢解與死亡鈍感
- 6 現代性：遺忘的文法與知識譜系斷裂，以中文脈絡下精神分析知識譜系的內在抗拒與斷裂為例
- 7 現代性：國家形式的視覺模式以及有關視覺矛盾，中國二十年代的前衛動力、國家形式與「煙囪掃除」論述
- 8 現代性：烏托邦想像的唯心觀點、崇高主體與妄想結構 I：中國三十年代之法西斯文本徵狀
- 9 現代性：烏托邦想像的唯心觀點、崇高主體與妄想結構 II：三十年代台灣的「本島」我與皇民主體，身分認同的斷裂與血的病變
- 10 主體位置與創傷

本人認為，截至目前為止，本人已經階段性完成了此計畫的最初目的。